

“元圣”伊尹：从莘野躬耕到商朝重要奠基者

■ 朱明华

伊尹,夏末商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商朝的奠基者之一,被后世尊为“元圣”。他的传奇生涯,起始于其隐耕之处——今山东莘县的“有莘之野”。夏桀暴政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之际,深谙尧舜之道的伊尹,感于商汤诚意“三聘”而出山。他凭借超凡才智与无私担当,辅佐商汤完成灭夏建商的历史伟业,并先后辅佐成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五位商王,在王朝初创与稳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与高尚品格,铸就了“元圣”的千古美名。

“元圣”之称始见于《尚书·汤诰》,其中记载“聿求元圣,与之戮力”,意思是商汤努力寻求伟大的圣人,与他一起齐心协力治理国家。《辞源》将“元圣”解释为“大圣人”,并明确指出元圣指的就是伊尹。后世也有人将“元圣”理解为首位且最伟大的圣人。

关于伊尹的名字及其由来。据《史记·股本纪》记载“伊尹,名阿衡,”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注释道:“《孙子兵法》:‘伊尹名挚。’孔安国亦曰‘伊挚’。然解者以阿衡为官名。”《辞源》也记载:“伊尹,商汤臣,名挚。后佐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宰相)。”郦道元在《水经注·伊水》中记载了关于伊尹出生的传说:“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由此可见,因相传伊尹出生于伊水流域,所以以“伊”为姓。对于“尹”这个称呼的来历,郦道元指出“殷以为尹,曰伊尹也”,意思是“尹”是他在商朝担任的官职,属于官职之名。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史记·股本纪》“伊尹”条目下注释称:“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古汉语大词典》同样记载:“尹,官名。商、西周时为辅弼(即辅佐)之官。”综上所述可知,伊尹本名挚,官号阿衡,“伊尹”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据历代方志记载,伊尹在出仕于商之前的隐耕处位于古莘地,即今山东莘县一带。明正德《莘县志·人物志》记载:“商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乐尧舜之道,汤三聘而起,相汤伐夏,救民,其事见《尚书·伊训》。”[考证]:按《孟子》传,莘,国名。《史记》:在汴州陈留县。赵氏曰:在同州郃阳县。未知孰是。而此莘地,载者世传当隐耕于此,县即其所耕之处,后人因立莘亭。《大明一统志》:莘亭在县北八里,世传汉时人创建,以表伊尹隐耕之迹,且立祠祀之。今亭废,遗址尚在。”这些记载表明,伊尹曾在莘县的有莘之野隐耕,直到商汤三次派人聘请,他才归附商汤。汉代时,人们在此地(古莘地,今莘县)修建了莘亭和伊尹祠。

古莘地(今莘县一带)之名,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记载。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晋代杜预注解道:“莘,卫地,阳平县(即后之莘县)西北有莘亭。”此外,历代方志均记载了此地有为纪念伊尹隐耕之处而建的“莘亭”,以及“伊尹庙”或“伊尹祠”。

关于伊尹“隐耕”的原因,史书记载,伊尹为逃避夏桀的暴政,选择在有莘之野隐耕。汉代韩婴所著《韩诗外传》中有这样的记述:“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度兮!趣归于亳,毫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骄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乐兮!’伊尹知大命之将去,平桀造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去矣,亡无日矣。’桀相

然而扑,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伊尹接履而趋。”这段文字描述了夏桀荒淫无道的景象,表明伊尹洞察到夏朝即将覆灭的局势,随后离开夏桀,开启了在田野间的隐耕生活。

至于伊尹后来放弃隐耕,出山辅佐商汤的原因与过程,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孟子·万章上》提到商汤“三使往聘”;《史记·股本纪》则列出两种说法,其一为“汤使人聘迎之,五反”后伊尹答应出山,其二为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孟子在《万章上》中否定了伊尹通过烹饪接近商汤的说法,直言“否,不然”,并强调“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接着,他阐述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理由以及伊尹接受商汤邀请、放弃隐耕生活的心路历程。孟子称,伊尹在有莘之野耕种,深爱尧舜之道。若不合道义,即便以天下为酬,以千匹良马馈赠,他也不会为之所动,更不会随意给予他人财物或者从他人那里获取分毫。商汤曾三次派人带着财物去聘请伊尹,起初他推辞,觉得在田野之间安享尧舜之道便已满足。但后来他转变想法,认为与其独善其身,不如帮助商汤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君主,让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他觉得,上天创造人类,就是要让先知先觉的人去唤醒后知后觉的人。自己作为先知先觉者,有责任以尧舜之道去唤醒百姓。若有一人未得恩泽,便如同自己将其推入沟壑之中。于是,他担负起天下重任去辅佐商汤,劝说商汤讨伐夏桀以拯救百姓。孟子还表示,他从未听闻有人不辨是非即能去纠正他人,更没听过牺牲尊严还能匡正天下的。圣人做事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根本在于保持自身的纯洁。

《史记·股本纪》记载了伊尹协助商汤推翻夏桀统治、建立殷商的过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娥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桀,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上述史料表明,伊尹跟随商汤征伐夏桀;战胜夏朝后,伊尹向诸侯通报战况,使得诸侯都心悅诚服。此后,商汤正式登上天子之位,平定海内,天下重归统一。

《史记·股本纪》还记载了伊尹辅佐商王治理天下的过程。成汤成为商王后,伊尹撰写了《咸有一德》,强调君臣应同心同德,秉持纯一之德治理国家,奠定了商初“以德治国”的理念基础。

《史记·股本纪》又载,汤王去世后,因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便立太丁之弟外丙继王位,继位二年外丙去世,便立外丙之弟中壬继王位。四年后中壬去世,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继王位。为教导新君,伊尹殚精竭虑。帝太甲元年,伊尹创作《伊训》《肆命》《徂后》三篇文章,阐述商汤德政与夏桀失德而亡国的教训,劝诫太甲遵循先王德治原则和汤的法度,以教导他成为贤明君主。

此外,文中还提及,太甲继位三年昏庸无道、荒淫残暴,且不遵商汤法令,伊尹将其放逐至桐宫反思,自己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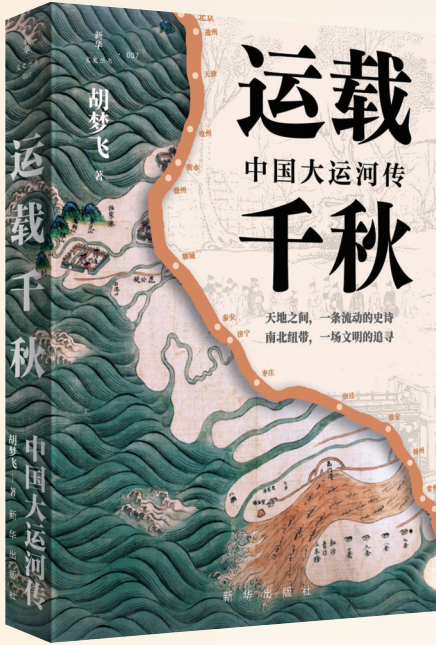
代理国政,诸侯皆听从号令。太甲在桐宫三年深刻反思、悔过自新。于是,伊尹便迎回太甲并交还国政。此后,太甲修养德行,诸侯纷纷归附,百姓安居乐业。伊尹赞赏他的改变,作《太甲训》三篇褒扬他,尊称他为太宗。帝太甲(太宗)去世后,他的儿子沃丁继位。沃丁在位期间,伊尹去世,被安葬在亳。咎单继承了伊尹的事业,教导百姓,创作了《沃丁》这篇文章来纪念伊尹。

对于伊尹罢黜太甲而自行行政这一举措,苏轼在《伊尹论》中评价道:“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苏轼这段话,剖析了伊尹废立太甲的行为能被天下人接受的缘由。伊尹废立太甲的行为之所以被天下人认可,是因为当时的人们理解并赞同他的做法。伊尹平日里对不道德之事不屑一顾,凭借高尚的品德和无私的精神树立起了崇高的威信,这使得他的行为能够被天下人所接受。

相较而言,孟子对此事的认识和论述更为深刻。《孟子·尽心上》记载,公孙丑向孟子提及伊尹放逐太甲之事,并询问贤臣是否可以放逐不贤的君主。孟子回答,如果有着像伊尹那样为天下百姓着想的公心,那么就可以这样做;如果没有这样的志向,那就是篡权行为。原文为,公孙丑问孟子:“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回应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此论,为后世处理君臣关系、臣子匡扶君主确立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政治伦理。

孟子在《万章下》中,精准概括了古代四位圣人的特点,他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圣之任者”这一评价高度肯定了伊尹强烈的责任心。太甲继位之初,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三文教导他;继位三年,太甲不遵循商汤法度、行事乱德,伊尹挺身而出。关键时刻的担当,尽显其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无愧于“圣之任者”的赞誉。

综观伊尹的一生,从莘野躬耕的贤者,到辅佐商汤灭夏立商的开国元勋,再到摄政匡君、奠定商朝基业的“元圣”,其非凡的政治智慧、深邃的思想与崇高的道德品格贯穿始终。他以天下为己任,无论是应商汤三聘而出山,还是放逐太甲于桐宫,抑或迎回太甲归政,皆以社稷苍生为念,完美诠释了孟子所誉“圣之任者”的内涵。苏轼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正是对其无私品格与经世伟业的高度凝练。“元圣”之誉,不仅彰显其道德的纯粹与功业的宏伟,更树立了后世君臣关系的理想典范——以天下公心为最高准则。伊尹,这位崛起于莘野的千古贤相,其声名德行,永载史册,光耀后世。



近日,由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胡梦飞撰写的《运载千秋:中国大运河传》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总计35万字,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通过生动的叙述和场景再现,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利用地图、图表、照片等多种方式,展示大运河沿线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全方位展现大运河的独特风貌。

《运载千秋:中国大运河传》一书共分为七章内容,从不同维度全面系统地展现中国大运河的辉煌历史、独特风貌及深远影响。其中,第一章为“流淌千年的国家命脉”,阐述大运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萌芽,到隋唐时期的形成,再到宋元明清各朝的繁荣与发展,以及近现代的保护与复兴历程。第二章为“运河工程里的科技智慧”,介绍大运河在漕运、水利、航运等方面所体现的制度文化和技术创新,展现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第三章为“跨越千年的漕运往事”,通过生动的叙述和场景再现,探讨历代漕运制度的沿革与变迁,展现大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调节南北资源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第四章为“大运河漂来的城市”,利用地图、图表、照片等多种方式,展示大运河沿线城镇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第五章为“运河流经百业兴”,分析大运河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桥梁,如何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第六章为“活在运河岸边的人们”,通过具体的事例和人物故事,让读者感受到运河精神在文化中的体现和传承。第七章为“大运河上的外国人”,以时间为主线,勾勒了唐宋至近代,不同国度、不同身份的外国人在眼中的大运河图景。

《运载千秋:中国大运河传》是运河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历史研究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该书首次以传记形式完整呈现了中国大运河两千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邳沟的起源,到隋唐运河体系的形成,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全面繁荣,直至近代的衰落与当代的复兴,著作构建了完整的历史叙事框架。作者不仅梳理了各个时期运河工程的修建历程,更深入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运河功能的演变及其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运河史研究提供了系统性的学术参考。

制度文化与技术智慧的深度挖掘。著作详细考证了大运河运营管理中形成的制度体系,包括漕运制度、河道管理制度、物资调配体系等。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细致梳理,再现了古代运河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揭示了传统社会在大型工程管理方面的智慧。同时,著作系统总结了运河建设中的工程技术成就,包括闸坝设计、水位调控、河道维护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为研究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的综合研究。该书突破传统水利工程研究的局限,将大运河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通过大量史料分析,详细论证了运河如何促进南北文化交融,包括戏曲、饮食、民俗、宗教等各个方面的传播与演变。著作特别关注了运河区域社会结构的变迁,分析了漕运体系下的各种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以及运河经济带来的商业繁荣和城市化进程,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

文献资料的丰富性与权威性。作者在研究中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包括正史、方志、档案、游记、文集等各类史料,同时参

一部运河文明的立体史诗

张东方

考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著作中对史料的考证严谨,注释详实,不仅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该书是胡梦飞副教授的重要研究成果,其学术研究具有诸多创新之处。

研究视角的创新:全球史视野下的运河叙事。该书最具突破性的创新在于采用了全球史的研究视角。作者专门设置“大运河上的外国人”章节,通过外国旅行家、传教士、使节的观察记录,构建了外部视角下的运河形象。这一创新使研究超越了传统的中原中心叙事,将大运河置于世界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国际人士的见证,揭示了大运河作为中外文化交流枢纽的世界意义,为运河研究开辟了新的国际视野。

方法论的创新:多维度的“三维时空”叙事结构。该书创新性地采用了“三维时空”叙事方法,将时间维度(历史演变)、空间维度(地理分布)和文化维度(人文内涵)有机融合。这种多维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线性历史的局限,使读者能够立体地理解大运河的复杂面貌。作者通过这种创新方法,成功地将水利工程、王朝兴衰、文化传播等多个层面的内容熔铸为一体,形成了全景式的运河历史画卷。

内容体系的创新:当代关怀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该书创新地将历史研究与当代价值相结合,专门探讨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作者不仅回顾历史,更面向未来,探讨了大运河在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及中外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古今结合的叙事方式,使历史研究具有了明显的现实意义,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新思路。

表达方式的创新: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该书在学术著作大众化和普及化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作者采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配以大量插图、地图等视觉元素,使专业的学术内容变得通俗易懂。同时,通过选取典型人物和事件进行故事化叙述,增强了著作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这种表达方式的创新,打破了学术著作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壁垒,实现了专业知识与大众传播的有效结合。

《运载千秋:中国大运河传》一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内涵和范围,拓展了研究视野,也为当前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该著作既有学术研究的深度,又具备文化传播的广度,是近年来大运河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